侯冠宇，胡宁宁. 能力赋能：以“投资于人”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研究［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25（3）：24-32.
HOU Guanyu，HU Ningning. Empowerment through capability： a study on promoting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Investment in People"［J］. Journal of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6，25（3）：24-32.
DOI：10.13842/j.cnki.issn1671-816X.2026.03.003

能力赋能：以“投资于人”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研究

侯冠宇[1,3,4]，胡宁宁[2,4]
（1.东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沈阳 100169；2.东北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辽宁 沈阳 100167；3.海信集团 博士后流动站，山东 青岛 266000；4.河北省重点高端智库“河北省公共政策评估研究中心”，河北 秦皇岛 066004）

摘 要：“投资于人”通过系统性的人力资本投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以此带动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基于能力赋能视角，构建“投资于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分析框架，指出其通过提升农民技能、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强化文化再生产能力、增强生态治理能力与优化基层治理结构等途径，实现人力资本向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能力转化。但“投资于人”仍面临产业经营能力弱化、人才持续外流、文化主体缺失、绿色技能匮乏以及基层组织动员能力不足等现实困境。为此，本文从产业能力构建、人才能力提升、文化能力培育、生态能力强化与组织能力重塑五方面提出系统性路径，以期通过更高质量、更高效能的“投资于人”，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持续、稳定的内生动能。

关键词：“十五五”时期；投资于人；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农业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4；F3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16X（2026）03-0024-09

一、研究背景

2023年5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同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此番讲话深刻阐述了通过全面的政策体系促进民生改善和共同富裕，推动全体人民全面发展的目标。2025年3月，“投资于人”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可见，“投资于人”不仅是民生层面的投入，更体现社会发展范式、资源配置与社会治理等方面的深刻变革。具体体现在人力资本的培养和提升上，强调从单纯依赖物质资本的扩张与要素积累，转向依赖人力资本的知识水平、技能结构与创新能力的提升，推动经济深层次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投资于人”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核心动能，其内涵不仅限于物质投入，更注重提升人的能力和素质，特别是在教育、医疗、就业和社会保障等关键领域的全面布局[2]。然而，在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下，乡村地区仍面临着人才外流、劳动力素质滞后、乡村主体弱化等深层次问题，传统的物质资本驱动增长路径已经无法支撑乡村振兴的长远目标。在此背景下，“投资于人”能有效优化乡村劳动力结构，提升乡村治理主体能力，还能够激发乡村社会的内生发展动力，为实现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动力。目前，学界已有研究从人力资本理论、农村劳动力流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等角度进行了探讨[3]。但总体上仍存在不足：一方面，缺乏基于“五大振兴”整体框架的系统分析，尚未构建“投资于人”在乡村振兴的各个领域中发挥作用的能力逻辑；另一方面，已有研究对现实中存在的能力短板、制度瓶颈与情境约束关注不足。因此，本文

收稿日期：2025-08-18 **修回日期：**2025-10-12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河北乡村振兴的多维机制与路径研究”（HB25KJ005）
作者简介：侯冠宇，研究方向：乡村振兴。

从能力赋能的视角出发，探讨“投资于人”如何在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等五大领域中重塑乡村振兴的能力体系，激发内生发展动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路径，力求为“十五五”期间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化实施提供学理支撑和政策启示。

二、理论逻辑：能力赋能视域下“投资于人”的赋能机理

“投资于人”之所以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变量，不在于其对单一要素的改善，而在于其通过人力资本积累、知识结构优化与能力体系重塑，推动乡村发展动力机制的整体跃迁。从能力赋能的理论视角看，“投资于人”贯穿“五大振兴”各领域的核心过程，并通过对劳动者能力、主体结构与治理机制的深层重构，形成乡村全面振兴的内生动力体系。

（一）产业振兴：重塑乡村产业体系的内生动能结构

能力赋能视域下的“投资于人”在于通过提升个体能力、集体能力与系统能力，重塑乡村产业体系的内在发展机制，实现从要素驱动向能力驱动、从外生拉动向内生增长的转型[4]。以“投资于人”提高农民与乡村产业主体的人力资本水平、组织资本水平和创新资本水平，塑造乡村产业振兴的可持续内生动能。

第一，以“投资于人”提升产业主体的人力资本质量，重构乡村产业发展的动力结构。从人力资本理论视角看，产业振兴首先源于主体能力的跃迁。我国各级农业农村部门通过“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等举措，累计培育高素质农民近800万人次，重点面向种养大户、家庭农场经营者、合作社带头人等产业主体，围绕全产业链开展系统培训[5]。新型职业农民、合作社骨干和乡村创业者能力提升，能够增强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标准化与精细化程度，推动产业从粗放式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并重的发展模式。“投资于人”在于通过知识更新、技能积累与认知升级，提高产业主体对市场变化、产业链重组和技术迭代的敏感度。

第二，以“投资于人”增强组织化与数字化能力，推动乡村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组织资本与数字资本的提升，是乡村产业由分散型向协同型、由要素型向能力型跃迁的关键。自启动“信息进村入户工程”以来，在每个行政村建设“益农信息社”，为农民提供公益、便民、电商等一站式服务。2023年底，益农信息社数量进一步增长到46.8万个，为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信息服务超过10.8亿次；同时通过“全农码”、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等手段，推动农村数字基础设施与数据资源的互联互通[6]。“投资于人”强化农民掌握数字技术、协作机制与组织治理的能力，使其能够融入现代产业链的分工体系，推动产业生产方式由个体分散经营向平台化、链条化、网络化发展。

第三，以“投资于人”构建复合型产业人才体系，强化乡村产业融合的系统支撑能力。乡村产业由单一农业向农产品加工、乡村服务、文化体验等多产业融合拓展，本质是一种复合型知识与跨界能力的要求[7]。农业农村部面向种养大户、家庭农场经营者、合作社带头人等开展全产业链培训，着力打造“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实施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培育为乡村产业振兴的“领头雁”[8]。

（二）人才振兴：构建乡村人才供给的高质量支撑体系

人才振兴的核心在于以“投资于人”重塑乡村人才供给结构、能力结构和发展结构，使乡村发展从要素驱动转向能力驱动。从理论逻辑看，“投资于人”强调人力资本的积累，还强调人才回流机制的重构与人才环境的优化，通过提高个体能力、活化人才流动与强化制度保障，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内生性、持续性的动力来源[9]。

第一，以“投资于人”提升乡村人力资本质量，缓解人才供给的结构性失衡。乡村人才流失与产业升级需求之间的“结构性错配”，本质上是一种人力资本积累不足与能力结构不适配的问题。理论上，以“投资于人”教育积累、技能提升和认知拓展，改善乡村人才的存量结构，并推动其与农业农村产业体系的需求端相匹配。教育提升与技能训练能够有效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和创新能力，破解乡村人力资源长期“低端化”“外流化”的矛盾。

第二，以“投资于人”激活城乡人才流动机制，构建乡村人才的多源补给格局。乡村人才不足源于供给不足，还源于流动机制不畅。“投资于人”从理论上强调“人才来源的多元化”与“人才流动的双向化”，即通过制度化安排降低人才回流成本、提高人才跨区域流动效率，形成外来人才、本土人才与返乡人才共同支撑乡村发展的格局。基于空间流动与人力资本理论，流动性本身就是一种资源，通过提高乡村吸纳人才的制度弹性和环境承载力，使乡村发展摆脱对单一人才来源的依赖，增强人才体系的韧性与多样性。

第三，以“投资于人”改善人才发展环境，构筑人才稳定扎根的制度与生态基础。乡村人才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形成吸引、留住、发展的良性循环，而这一循环依赖于制度供给与生活环境的长期优化。通过改善公共服务、提升职业发展空间与增强社会认同感，构建稳定的乡村人才生态，使人才在乡村具备可预期的收益和可发展的空间。

（三）文化振兴：激活乡村文化再生产的价值凝聚机制

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不在于文化设施的盲目扩张，而在于以“投资于人”增强文化主体性与价值整合能力。从逻辑上看，“投资于人”以能力提升为抓手，以价值认同为纽带，以精神涵育为支撑，推动乡村文化由静态向动态生成转变。

第一，以“投资于人”增强文化主体能力，推动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文化振兴的本质在于文化主体能力的强弱。基于文化再生产理论，文化能否实现代际延续与创造性转化，取决于文化主体的理解、表达与创新能力。“投资于人”可以提升村民、乡贤、文化能人以及基层文化组织的知识结构、审美感知和文化表达能力。同时，通过强化其创新应用、跨界表达与数字媒介使用能力，使传统文化得以在现代技术、审美需求与消费模式中实现“现代转换”与“创造性转化”。

第二，以“投资于人”提升文化认同构建能力，强化乡村共同体价值整合与社会凝聚。文化认同理论强调，认同并非自然形成，而是在对共同记忆、共同价值与共同象征的理解、阐释与接受中不断生成。“投资于人”可以提高乡村个体意义建构能力、价值辨识能力与公共表达能力，使其能够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形成共享的价值坐标与文化基础。能力提升促使村民在公共事务、文化活动与社区治理中具备更强的沟通、协调与参与能力，文化得以转化为维系社会秩序、增强集体意识与提升村庄治理效能的核心要素。

第三，以“投资于人”强化人文素养与精神力量，提升乡村文化体系的韧性与内生稳定性。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依赖于群体的审美素养、价值判断能力与公共理性基础。“投资于人”可以提升乡村个体的人文素质，使其具备应对外来文化冲击、化解价值焦虑与形成文化安全感的能力。较高的人文素养促进乡村社会形成稳健的精神支持系统，增强文化体系的自我调节、自我更新与自我增值能力。

（四）生态振兴：强化绿色发展导向的生态治理能力体系

生态振兴的关键不在于单纯扩大生态投入，而在于构建能够支撑绿色生产方式、绿色生活方式与绿色治理方式的综合能力体系。“投资于人”可以提升乡村主体的生态知识、生态治理能力与生态价值认同，推动乡村生态从外源驱动向内生演化转变。

第一，以“投资于人”提升生态知识结构与绿色生产技能，促进乡村绿色生产体系的内生演化。绿色生产方式的转型，关键在于主体生态认知与技术能力的提升。传统农业生产面临资源高消耗、化学投入品依赖度高、环境外部性显著等问题，其深层根源是农民生态知识不足与绿色技能体系薄弱。“投资于人”可以强化农民对生态系统结构、农业生态过程以及绿色生产技术的理解，使生态约束、生态价值与长期效益内化于生产决策逻辑之中。随着生态素质提升，乡村主体能够主动调整种养结构、减少资源浪费并提高生态效率，推动绿色生产体系从政策驱动向能力驱动转变。

第二，以“投资于人”增强基层主体的生态治理能力，推动乡村生态治理体系能力化重构。生态振兴的实质在于现代生态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形成。生态治理的有效性依赖制度供给，更取决于基层干部、村集体组织与村民群体的治理能力，包括生态识别能力、治理协同能力、规则

执行能力与风险预判能力[10]。“投资于人”可以提升基层主体专业知识储备、协调能力以及制度理解水平。能力提升促使乡村生态治理结构由行政主导向社区共治转变，由单向管理向协同治理转变，由事后治理向源头预防和过程治理转变。

第三，以“投资于人”培育生态文明意识与价值认同，夯实乡村绿色生活方式的文化根基。生态意识与生态价值的内在化，是推动社会绿色转型的关键前提，而生态意识的形成依赖人文素养、价值理念和公共责任感的提升。以“投资于人”加强村民的生态价值理解能力、环境伦理意识以及绿色生活实践能力，使绿色生活从外部规制要求转变为主体自觉行动。生态价值认同的提升，增强乡村社会抵御外部环境冲击的能力，形成生态保护的文化自觉、行动自觉与制度自觉。

（五）组织振兴：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协同基础

组织振兴的逻辑在于以“投资于人”重塑乡村治理主体的知识结构、组织能力与协同能力，使基层治理体系从传统经验型模式向制度化、能力化、现代化方向演进。以“投资于人”增强治理能力、集体行动能力与协同治理能力，实现乡村治理秩序的自我调节、自我组织与自我进化[11]。

第一，以“投资于人”提升基层治理主体能力，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向现代化范式转型。治理能力是组织振兴的基础，而治理能力的形成依赖于治理主体的知识储备、制度理解与复杂问题处理能力。基层治理从传统熟人社会逻辑向法治化、制度化、多元化治理逻辑转型，关键在于提升基层干部的治理素养、公共管理能力与数字治理适应能力。以“投资于人”强化治理主体的认知能力、制度执行能力与公共服务能力，推动治理模式从“经验治理”向“专业治理”，从“行政推动”向“能力驱动”转变。

第二，以“投资于人”提升农民组织化能力，强化乡村集体行动与资源整合的制度基础。乡村组织振兴不仅取决于基层干部能力，也取决于农民的组织化水平。根据集体行动理论，组织化能力是小农社会实现有效治理与经济协同的核心变量。以“投资于人”增强村民在议事表达、公共参与、利益协调与内部治理中的能力，使乡村群体具备更强的集体行动能力与公共事务处理能力。

第三，以“投资于人”增强多元主体协同能力，构建乡村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现代乡村治理的特征在于多元主体参与，而协同能力成为治理效能的决定性因素。协同治理理论表明，政府、市场与社会主体之间形成协同结构时，治理体系能够实现能力互补、资源共享与目标一致。以“投资于人”提升各类治理主体的协同意识、协作技能与制度理解，使乡村治理能够突破单一主体治理的瓶颈，形成政府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基层自治共同作用的治理格局。

三、现实困境：能力赋能视域下“投资于人”的结构性障碍

“投资于人”在实践中仍受到多重结构性瓶颈的制约，使人力资本投入难以有效转化为发展能力。现实问题相互交织，难以形成支撑“五大振兴”的完整能力链条。

（一）产业短板：经营能力弱化与技能断层并存

在能力赋能视域下，“投资于人”赋能乡村产业发展的现实困境主要体现为经营能力弱化与技能断层的结构性叠加。一方面，乡村产业主体普遍存在经营规模偏小、经营方式传统、市场敏感度不足等问题，许多农户和基层经济组织仍依赖经验式生产，缺乏成本核算、市场研判、品牌建设等现代经营能力，合作组织内部治理不规范、带动能力有限，产业体系难以形成稳定的增值机制与风险应对能力[12]。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结构持续老化，青壮年大量外出务工，农业人力资本“空心化”，基层农技推广体系人才老化、专业化水平不足，新技术应用与新模式推广困难[13]。

（二）人才缺口：人才外流严重与激励供给不足

“投资于人”在乡村人才振兴中的现实困境主要体现为人才外流与激励不足的双重约束。一方面，长期的城乡发展差距使农村成为净人才流出地，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群体向城市集聚，乡村人口结构持续老龄化，本土人才在数量与质量上减少，农业科技、教育医疗、文化治理等领域出现断层。另一方面，乡村在薪酬待遇、发展空

间、职业认同、公共服务等方面相较城市具有明显劣势，现有激励政策在覆盖范围、落实力度与实际吸引效应上均有限，难以支撑人才长期扎根乡村、投身乡村治理与产业发展。人才持续外流与激励供给不足相互叠加，乡村陷入人才难来、来了难留、留了难用的困境[14]。

（三）文化弱化：文化主体缺失与认同结构松动

“投资于人”在文化振兴层面的现实困境主要表现为文化主体弱化与认同结构松动的双重压力。一方面，随着农村人口长期外流、劳动力结构持续空心化，乡村文化的传承主体和组织主体不断减少，传统文化载体的维护者、乡贤群体及民间艺人呈现老龄化与后继乏力并存的局面；基层公共文化供给能力薄弱，文化活动组织碎片化、文化空间利用不足等问题持续存在[15]。另一方面，乡村社会的共同体认同在城乡流动加剧、外来文化深度介入的背景下明显削弱，部分年轻群体对本土文化缺乏认同感和情感连接，传统乡土伦理、集体记忆与价值规范被市场文化与网络文化重塑[16]。

（四）生态滞后：绿色技能缺乏与治理体系薄弱

“投资于人”在生态振兴领域的现实困境主要体现在绿色生产技能匮乏与基层生态治理体系薄弱的双重滞后。一方面，大量农户仍停留在粗放型生产与生活方式中，环保知识缺乏、绿色技术掌握不足的问题普遍存在，无论是化肥农药科学施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还是生态农业的基本原理与操作规范，存在明显的能力缺口；青年群体虽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基础，但对生态农业的专业技能、绿色产业的新模式理解有限。另一方面，农村生态治理体系建设与能力提升长期滞后，基础设施薄弱、治理力量不足、监管体系碎片化的问题突出，污水处理、垃圾收运等设施覆盖不全面、运行不稳定，生态治理更多依赖上级专项整治而难以形成常态化机制；基层干部的生态治理专业素养有限，对面源污染、水体黑臭等环境问题缺乏系统治理的能力。

（五）组织乏力：基层治理失配与组织动员不足

“投资于人”在组织振兴层面的现实困境主要表现为基层治理机制失配与组织动员能力不足的系统性掣肘。一方面，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要求与基层组织实际能力之间存在明显不匹配，传统的行政主导型治理模式难以应对乡村社会结构多元化、利益格局分化带来的复杂挑战；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制度化渠道不足，村民自治形式化、社会组织培育乏力。另一方面，基层组织在社会动员、公共事务协调等方面的能力不足，组织权威与凝聚力下降，村民对公共事务关注度不高、参与度偏弱，信任基础薄弱，使组织对重大事项的发动力、协调力明显不足[17]。

四、现实路径：以“投资于人”提升乡村全面振兴的体系路径

能力赋能视域下“投资于人”需要从系统工程的逻辑出发，围绕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关键领域构建协同联动的能力支撑体系[18]。现实路径基于“投资于人”这一核心理念下相互支撑、相互增益，从而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稳定、持久、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一）构建乡村产业升级所需的人才与动能体系

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在于以“投资于人”为基础，构建覆盖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的能力体系，通过政策环境与服务体系的优化确保人才“引得来、育得好、干得稳、留得住”，形成支撑乡村产业可持续振兴的能力基础。

第一，实施高素质农民与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工程，构建乡村产业人才梯队。产业能力的核心在于人才供给质量，因而需通过系统性人才培养计划壮大乡村产业人才队伍[19]。具体而言，推进高素质农民培育与农村实用人才培养，通过学历教育、技能培训与实践教学并行，提高农民在现代农业、经营管理、加工流通等领域的能力；分层分类培育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主、合作社骨干和农村创业者；推进农村创业创新带头人培养与返乡创业支持工程。

第二，健全产教融合与科技推广机制，增强产业人才供给的适配性与持续性[20]。为此，应深化涉农职业教育改革，优化专业设置、课程体系与人才培养规格；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与新型经营主体共建产业学院、实训基地与联合培养平

台，推动人才培养链、技术创新链与产业链“三链协同”；强化农技推广体系建设，推动科研人员、科技特派员与基层农技人员常态化深入乡村，实现科技成果的可用化、可学化与可推广化。

第三，完善政策扶持与综合服务体系，为产业人才发挥作用提供制度化保障。人才能力能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关键在于制度环境与服务体系是否具有吸引力与支撑力。在财政支农资金、乡村产业项目和公共资源配置中适度“向人倾斜”，对新型经营主体、返乡创业者和涉农人才给予项目支持、金融信贷与创业补贴；在职称评审、岗位聘任、专业技术人员流动等方面设置乡村特别通道；健全乡村人才服务体系，为下乡人才提供创业辅导、法律援助、技术对接、生活服务等“一站式支持”。

（二）完善多层次乡村人才培养、引进激励机制

乡村人才振兴的现实路径应围绕育才、引才、留才三个关键环节构建系统完备的人才生态体系，实现从人才供给不足到多元化供给、从人才流失严重到双向流动、从人才难留难用到环境友好型治理的转变。

第一，完善乡村人才培养体系，夯实本土人才成长基础。人才培养是乡村人才生态的源头环节，需要构建覆盖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与终身培训的全链条培养体系[21]。一方面，持续提升农村基础教育质量，通过推进城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改善办学条件、提升教师素养等措施，提高农村学生教育水平。另一方面，深化面向乡村产业需求的职业教育改革，依托职业院校、技工学校开设涉农专业和乡村建设类专业，探索“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就业”的培养方式。同时，创新农民继续教育方式，通过整合各类农业教育资源，构建开放灵活的农民教育体系，推广学习成果认证和技能等级认定制度。

第二，健全多元化人才引进与流动机制，畅通城乡人才双向流动渠道。乡村人才生态的完善离不开外部人才的流入和合理的跨区域流动机制。引导医生、教师、技术人员、文化工作者等专业人才以轮岗交流、柔性引才等方式参与乡村建设[22]，并在职称评审、岗位聘任、薪酬待遇等方面给予政策保障。同时，积极吸引外出务工人员、乡贤人才及在外专业人士返乡创业，通过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创业载体建设与政务服务优化推动人才回流、项目回迁、资本回乡。此外，完善面向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重点就业群体的就业政策，规范和提升大学生村官、西部计划、“三支一扶”等项目，让青年人才有制度化途径扎根乡村。

第三，健全乡村人才激励保障机制，营造人才愿意来、留得住、干得好的制度环境。人才作用的发挥取决于能力水平，更依赖于制度激励与环境支撑。要健全多元化激励保障制度，通过提高基层专业人才待遇、设立岗位补贴、完善艰苦地区津贴制度等方式增强物质激励力度；要在职称评审、岗位晋升中单列乡村人才评审序列，破除单一的评价取向。同时，完善乡村人才综合服务体系，通过提供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便利条件减轻人才后顾之忧，建立常态化联系关怀机制，增强人才的归属感与认同感。

（三）夯实乡村文化再生产与精神文明建设支点

文化振兴的现实路径应从建设文化阵地、壮大文化主体、涵育文明风尚三方面系统推进。其关键在于完善公共文化供给体系、激活文化生产主体、塑造文明乡风，实现文化传承、文化创新与文化治理的协同提升[23]。

第一，加强乡村文化基础设施与阵地建设，夯实文化再生产的物质基础。乡村文化能力的提升，首先依赖稳定、可持续的文化活动空间与基础设施。依托乡村建设行动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推动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文化礼堂、农家书屋、文化广场、乡村戏台等文化阵地提档升级；对祠堂、戏楼等传统文化设施进行保护性修缮并转化为公共文化空间，使传统文化载体融入现代文化生活；完善乡镇文化站功能，推动农家书屋常态化运营、图书更新与管理人员配备。

第二，培育多元化文化主体与乡村文化产业，激发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内生动力。文化能力的核心在于文化主体，乡村文化振兴需要一支能够承担文化传承、文化表达与文化治理的多元主体队伍。选拔、培育本土文化能人、乡村文艺骨

干、非遗传承人等文化主体，通过技能培训、活动支持和经费保障，提高其文化创造力与组织力；支持乡村文艺团队、民俗团体、非遗传习队伍发展，形成常态化文艺活动供给；引导城市文化人才、艺术机构、社会组织通过文化志愿服务、专业辅导等方式参与乡村文化建设[24]。同时，依托乡村资源禀赋，发展民俗文化、乡村演艺、文化创意、非遗产品等特色文化产业。

第三，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与公民道德建设，提升乡村精神文明水平。文化振兴的关键在于精神文明建设，通过价值引导、行为规范与典型示范提升农民文化主体性。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开展移风易俗、文明新风建设、党史国情教育等活动，引导村民践行勤俭节约、孝老爱亲、守信重义等价值规范；结合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等自治制度，规范婚丧嫁娶、祭祀礼俗等行为；通过“乡村好人”等机制，发挥榜样教化效应，营造见贤思齐、向善向上的良好氛围。

（四）构建绿色生产、生态治理与意识培育体系

乡村生态振兴的现实路径应从绿色生产能力、基层治理能力与生态文明意识三方面展开，将“投资于人”贯穿于绿色技术普及、基础设施完善和公众生态意识涵育之中，提升农民生态技能，强化基层治理执行力与提高村民生态参与度。

第一，深化农业绿色技术推广与生态产业培育，系统提升农民绿色生产能力。绿色生产能力建设是乡村生态振兴的核心，应通过技术示范、培训赋能与产业引领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农业绿色生产体系。具体而言，推动区域化、精准化的农业绿色技术普及，重点组织实施测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化、生物防治等绿色生产技术示范，并通过分层次培训提高农民对绿色技术的理解与应用能力；构建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体系，引导合作社、家庭农场与企业建设粪污处理、秸秆收储运与循环农业示范项目；依托生态资源优势发展有机农业、生态农业、休闲农业与生态旅游，提高农户参与生态产业链的组织化程度与利益分享水平。

第二，加快完善农村环境基础设施与治理机制，增强基层生态治理能力。具体而言，基于城乡统筹原则推进污水处理、垃圾收运与农村管护设施网络建设，东部地区可逐步实现农村污水“纳管入网”，在中西部地区推广经济可行的分散式处理模式；健全村庄环境治理制度体系，通过村庄保洁制度、河长制林长制田长制等责任机制实现对河道、林地与农田的日常治理与管护；加强基层环保队伍建设，通过配强乡镇环保力量、开展治理技能培训与设立生态环境委员会夯实基层生态治理基础。

第三，强化生态文明教育与公众参与，提升村民环保意识与参与能力。生态意识的培育是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长期基础，需要通过教育灌输、机制激励与公众参与构建协同推进格局。具体而言，将生态文明教育纳入村民教育体系，通过广播、新媒体、宣传栏、文化墙等多元载体持续推广绿色生活理念，使环保意识融入日常生活；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以垃圾分类、节能环保、移风易俗为主题的文明实践活动，通过志愿服务、文艺宣传与亲子互动等方式实现生态理念的代际传递；构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平台，通过环境信息公开、环保议事会、举报奖励机制等方式，增强村民在环境监督、治理协商与公共决策中的参与度。

（五）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与多元协同共治格局

基层治理能力的提升是乡村全面振兴的组织基础。“投资于人”的现实路径应从治理主体能力建设、治理机制完善与多元协同体系构建展开，加强基层党组织领导力、健全自治法治德治机制以及推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

第一，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夯实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领导基石。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治理体系的核心，应通过提升组织领导能力与干部能力实现治理现代化目标。具体而言，持续优化村党组织带头人选拔与培养机制，注重从本村致富能手、返乡大学生、退役军人中储备后备干部；加强村党组织书记和班子成员的系统培训，提升其在政策理解、资源统筹、矛盾调处、数字治理等方面的能力；完善议事决策与公开制度，通过村务公开、财务公开与民主议事程序提升党组织的透明度与公信力；对涣散基层党组织实施精准

整顿，派驻第一书记和工作队，提升其组织力、凝聚力与战斗力。

第二，健全村民自治体系与法治保障机制，提升乡村基层组织动员与治理效能。乡村治理现代化要求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核心在于提升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与依法治理水平。具体而言，规范村级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完善村务公开制度与村干部述职评议制度；推进乡村法治建设，开展法治宣传教育、“一村一法律顾问”等措施；强化基层调解机制，推动村级调解委员会、乡贤调解团等主体在矛盾化解中发挥作用。

第三，构建政府、集体、市场与社会力量协同参与的乡村治理共同体，提高集体行动与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乡村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多主体协同，通过组织动员、制度创新与平台建设推动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形成。具体而言，积极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引导其在公共服务、文化建设、环境治理中承担角色；发挥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合作经济组织的功能优势，使其在公共设施建设、风险救助、产业服务等方面补位基层治理；鼓励企业与“新乡贤”参与治理，通过设立乡贤理事会、企业公益项目等方式在纠纷调解、道德教化、公益事业中发挥作用[25]；推动数字乡村建设，构建线上线下联动的治理平台，增强治理体系的透明度、互动性与协同性。

五、结语

“投资于人”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支点，也是实现农业强国建设目标的长久动力。“投资于人”将政策资源由传统的物质性投入进一步拓展至人力资本投入，通过教育培训、公共服务、制度供给等手段持续增强乡村主体的行动能力、创新能力与治理能力。通过系统提升农民与基层干部的知识结构、技能水平与综合能力，重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机制，这一逻辑契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高度一致。因而，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阶段，要坚持把“人”作为最关键的变量，以更大力度推进能力提升工程，持续优化制度保障与发展环境，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能力的整体跃升。

参 考 文 献

[1] 习近平.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J]. 求是，2024（22）：4-8.

[2] 李海辰，杨蔚. 深入理解“投资于人”的科学内涵与实践进路[J]. 经济学家，2025（9）：36-46.

[3] 倪红福，王晓星. 以“投资于人”推动高质量发展：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J]. 改革，2025（6）：42-55.

[4] 刘志彪，孙文婷. 投资于人：发展动能转换的逻辑与产业政策取向[J]. 南京社会科学，2025（9）：30-40.

[5] 郁静娴. 汇聚乡村全面振兴的人才底气[N]. 人民日报，2024-01-04(010).

[6] 王志刚，胡宁宁，项猛. 资源与能力视角下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基于110家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验分析[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4，45（5）：78-95.

[7] 侯冠宇，李红发. “十五五”时期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河北乡村振兴研究[J/OL]. 科学与管理，1-11[2025-11-19]. https://link.cnki.net/urlid/37.1020.G3.20251016.1540.004.

[8] 周春霞. 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村庄差异、新乡贤类别与作用模式选择——以粤西地区Z市四类村庄为例[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50（3）：80-95.

[9] 盛磊，应晓妮，刘立峰. 统筹“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理论、经验和路径[J]. 宏观经济研究，2025（7）：31-38，72.

[10] 张文英. 数字经济赋能农业生态环境改善：影响及机制[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4（5）：51-63.

[11] 侯冠宇，闫芳超. 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内涵、价值与进路[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2（1）：143-152.

[12] 申学锋，何妮，李政.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问题与路径选择[J]. 财政科学，2023（9）：87-94.

[13] 杨素雯，齐鹏. 农村人口空心化：多维内涵、潜在风险与治理策略[J]. 东岳论丛，2025，46（2）：139-148，192.

[14] 侯冠宇，张震宇. 因地制宜：低空经济助推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与着力点[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4（5）：74-81.

[15] 何亚芬，潘依玲，谢花林.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乡村文化振兴双向赋能的机制与路径——基于“人—文—术—业—制”五维协同视角[J]. 自然资源学报，2025，40（11）：2979-2998.

[16] 崔建利. 乡村全面振兴视域下农村青年公共精神的培育[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5（6）：49-57.

[17] 黄世臻．“空心村”治理的困境、构想与模式研究——基于优化的集体行动理论[J]．城市规划，2024，48（11）：37-43.
[18] 侯冠宇，张楚．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4（6）：9-14.
[19] 钟真，万禹彤，李亦然．主体工具化视角的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J]．改革，2025（9）：109-121.
[20] 李荣胜．乡村振兴背景下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路径研究[J]．中国高等教育，2022（7）：59-61.
[21] 苏平森，杨雪楠．乡村本土人才培养体制机制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5，46（8）：205，227.
[22] 张广辉，陈鑫泓．乡村振兴视角下城乡要素流动困境与突破[J]．经济体制改革，2020（3）：195-200.
[23] 文丰安，刘昊东．乡村数字文化建设的现实困境与破解路径[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5（5）：65-74.
[24] 时孜腾，陈鹏．从共识到协同：乡村文化治理价值体系的现代性构建[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27（5）：98-108.
[25] 侯冠宇．富民强农：民营企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商业模式创新研究[J]．阅江学刊，2025，17（4）：124-138，174.

Empowerment through capability： a study on promoting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Investment in People"

HOU Guanyu[1,3,4]，HU Ningning[2,4]

（1. *School of Marxism*，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00169， *China*；2.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00167， *China*；3. *Postdoctoral Station*， *Hisense Group*， *Qingdao* 266000， *China*；4. *Hebei Province Key High-End Think Tank*， *"Hebei Public Policy Evaluation Research Center"*， *Qinhuangdao* 066004， *China*）

Abstract：＂Investment in People＂ fosters the holistic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by strategically investing in human capital，which，in turn，drives the five pillar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industry，talent，culture，ecology，and organization. This study，framed within the perspective of capability empowerment，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leveraging ＂investment in people＂ to promote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It explores how this approach enhances farmers′ skills，nurtures new business entities，strengthens cultural reproduction capacities，advances ecological governance，and optimizes grassroots governance structures，ultimately transforming human capital into key capabilities for high-quality rural development. Despite its potential，＂investment in people＂ encounters structural challenges，including weak industry management capabilities，ongoing talent outflow，a lack of cultural agency，insufficient green skills，and inadequate grassroots organizational mobilization. To overcome these challenges，this paper proposes a systematic pathway focused on industrial capacity building，talent development，cultural empowerment，ecological enhancement，and organizational reform. The goal is to provide sustainable，endogenous momentum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more efficient and high-quality ＂investment in people＂.

Keywords：15th Five-Year Plan；Investment in People；Rural revitalization；Common prosperity；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